

# 第十章

## “文革”浩劫之始

###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三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五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争论的问题，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及其必然引起的斗争。党内“左”的错误在不断发展，海军的这场争论也不可能完结。如果是作为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斗争，本来是可以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途径来解决的，但是，随着“文革”大气候的逐渐形成，这场争论中所蕴藏的不正常之点，却越来越扩大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海军党委“三·二”会议正在进行之中，我接到通知去参加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批判罗瑞卿为中心议题的。罗瑞卿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年的下半年开始，陆续听到过一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说法，但对

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罗瑞卿同志问题的性质，我是一无所知的。在我去前，中央工作会议似乎已经在更小的范围里开了一段，我去参加的是扩大了一点的会议，仍有打招呼的性质。使我感到突然的是，会议传达的罗瑞卿同志的问题，竟已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而是冠之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有个人野心，想篡夺军委领导权几顶帽子，甚至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判。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因为一个多月以前，我刚刚参加了军委扩大的办公会议，听了罗瑞卿同志对当年工作的总结和第二年工作的打算的讲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而此时这几顶帽子一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主要罪名，却不禁使我联想起这几年林彪对我的批评和海军争论的那些问题，心里很沉闷。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是十分信任的，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了的问题，我们都深信不疑，所以不仅对罗瑞卿问题深信不疑；而且对自己也进行了必要的反省。但是除了这些思想之外，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这一感觉主要是从会上看到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名给林彪的信引起的。这封信，搞了所谓的罗瑞卿阴谋占领海军阵地的“十条”。这“十条”联系了自一九六三年以来罗瑞卿对海军工作的影响，矛头对着

罗瑞卿，也同时指向了我和苏振华同志。这封信提出，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罗瑞卿在对待海军问题上，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掩盖调和矛盾；第二是一谈就顶，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和汇报；第三是“颠倒是非”，“对错误的同情支持，对正确的责难打击”。这个所谓的正确与错误，自然是以海军“三·二”会议上他们划分的正确与错误为标准的。这封信上，暗示我与苏振华是罗瑞卿线上的人，说，“我们估计他们对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不通，都存在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加上对林副主席的一些正确的批评不满，就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了。”甚至说，“不知他们是不谋而合，还是有谋而合。总之，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是有阴谋活动的，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报复。”

我认为，在海军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报告并不是不可以，但用这样恶毒的语言，进行这样毫无根据的判断推理，就是不正常的了。更何况，有的人并没有参加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不应该知道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定性处理的基调，没有道理与李作鹏联名写信。而且，材料写于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发于中央工作会议之中，显然是有预谋的。诚然，他们在幕后搞了些什么活动，我不得而知，但就这些迹象，已使我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如果是有人支持他们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林彪。从以后揭发的材料得知，上海会议之前，海军

的“三·二”会议还没有结束，林彪让秘书给李作鹏打了一个这样内容的电话：请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从打沉敌舰以后，罗、肖的表现，在每个问题上罗的表现怎样，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李作鹏等便搞了这样一个材料。这样，李作鹏带着这个材料去参加了先期的上海会议，而我到会的时候，看到的是已经印发会议的材料。事实证明，搞阴谋活动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林彪、李作鹏等人。

大约是在离开上海的前一二天吧，我接到林彪处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请我去谈一谈。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是很想与林彪谈一谈自己的思想的，一方面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错误，一方面对李作鹏等揭发中的不实之词当面向林彪作一些解释。但同时，我也感到有些惶惑，就上海会议的一些突然袭击式的做法，我不知林彪的用意，也不知是不是会有什么灾难落到我的头上。待我如约到达林彪住处的时候，接待我的却是叶群。她说林彪近些天来身体很不好，正在睡觉，委托她与我谈一谈。谈到李作鹏等揭发的我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叶群说我这些年来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反对林彪，并说希望我起来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我对林彪避而不见的做法，不能不有所考虑。而且，我感到有些问题是不便与叶群谈的。所以，我只是一般地谈了谈自己对工作上的“错误”的认识，对李作鹏等揭发信中的一些情况做了些说明，请叶群转达林彪。临走时，叶群弦外

有音地对我说，“你身体不好，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要多管了，让李作鹏他们干去。”还说，“你回去后，不要参加‘三·二’会议了，你放心，李作鹏不会夺你的权。”这些说法不能不使我领悟到林彪让我向李作鹏交权的用意。

上海会议罢了罗瑞卿同志的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接替罗瑞卿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涉及了海军内部的问题以外，空军也是一个首当其冲地卷入罗瑞卿问题的单位，因为当时揭发罗瑞卿同志的问题，用的是已故去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名义，这在会议上影响极大。所以，在上海会议中，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央打招呼说，除了罗瑞卿问题，各单位自己的问题不要在会上扯。会议结束时，又决定牵扯海、空军以及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向下传达，文件也一律不下发，到此为止。问题就这样暂时地搁了下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底到三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召集了全军范围内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内容是贯彻上海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批罗”的工作。

本来，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并没有各大单位的政治部主任，而林彪却指名让海军张秀川参加会议。这样，海军有我、苏振华、李作鹏、张秀川四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李作鹏、张秀川多次地抢先发言。他们不顾会议规定的只批罗瑞卿、不扯本单位情况的规定，仍旧发言把海军的问题

联到所谓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问题上去。他们在会上会下散布说，上海会议分三批有三种，第一种是反罗瑞卿的，第二种是罗瑞卿分子和半罗瑞卿分子，第三种是无所谓的，并暗示肖、苏是第二批第二种人。之后，他们又再次分别搞了肖劲光与罗瑞卿问题的“十六条”和苏振华与罗瑞卿问题的“十一条”，重蹈上海会议的复辙并加以发展，企图在海军搞罗瑞卿分子。

但是，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的情况下，虽有林彪的授意，但李作鹏等的阴谋活动并没有得逞。三月五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预备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当讲到海军问题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说，海军有一个时期工作有缺点，这几年有改进，领导之间有意见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肯定了我和苏振华同志在海军中的工作，指出有缺点错误是工作上的问题。因为，当时已把罗瑞卿同志当作敌我矛盾了，中央领导同志把我们的问题划到了另一范畴，显然是否定了李作鹏等的意见。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山雨欲来风满楼”，随即到来的，便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受全国“文革”总的形势的制约和影响，海军同样不

能幸免于这场灾难。作为一名老战士，我曾经历了到目前为止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胜利和挫折，我感到，“文化大革命”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的经验教训，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事件所不曾有过的。这个由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它。借鉴它，并运用它来教育我们的后代。时至今日，我们对“文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尚不能说是全面、深刻的。所以，我想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回顾自己在“文革”中的亲历，管中窥豹，为我们的党和人民深化对“文革”的认识，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开拓未来，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 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

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之后，为了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布置海军的“批罗”工作，海军党委决定召开一次党委全会。这次党委全会究竟怎样开，是一个颇费脑筋的事。经过海军“三·二”会议，又经过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海军党委内部自一九六二年以来的一些分歧意见愈加尖锐化。李作鹏等竭力想把海军这几年的争论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使这次党委全会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形势，弄得不好，将会再次形成僵局，更有害于团

结。这是我们大多数海军党委常委同志所担心的。当然，我们的这种担心并没有充分估计到李作鹏等秉承林彪的旨意，企图搞乱军队的险恶用心，而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从大局出发，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纠正缺点错误，搞好海军的工作。因此，在党委全会召开之前，海军党委召开常委会，结合“批罗”，联系海军这几年的工作，常委内部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苏振华同志都作了检查，对这几年海军工作出现的“偏差”承担了责任。常委会议决定起草一个联系海军实际，“肃清罗瑞卿影响”，以党委名义作自我批评的文件，并初步决定党委检查的重点放在一九六三年以后。我记得这个文件主要批判了罗瑞卿“干扰破坏”海军贯彻林彪三条指示，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检查了海军党委建军方向偏，军事第一、技术第一，党委主要领导（指我）犯了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这些批判和检查，自然是在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下的产物。然而，这些批判和检查的基调又是很难适应当时“左”的需要的。因此，在讨论文件初稿的时候，常委内部仍旧有这样的意见，即海军的团结问题是罗瑞卿的影响造成的，这一问题是两条路线的问题。但大多数常委的意见是，海军党委内部的团结问题不要与罗瑞卿“反党”联系在一起，错误性质不同。在这期间，军委领导同志也一再指示，海军的团结问题和罗瑞卿问题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海军党委全会要集中批罗，不要扯

、海军党委内部的团结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作出决议，在这次党委全会上不扯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期间，李作鹏称病在庐山休养，没有参加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当常委会议就这一决议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没有反对，并从庐山写信给党委常委会议，表示同意全会不扯海军内部团结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三·三”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有三个议题，一是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全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预计会程一个月。鉴于当时海军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上暴露出的问题，为了及时掌握会议的情况，军委派了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同志、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同志、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同志三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海军的“三·三”会议。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继报纸上公开批判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之后，一场名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已从学术领域迅速向政治领域发展。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全党内批判了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二月提纲”，党内已有了“彭、罗、陆、杨”之说。在军

队内部，总政治部的《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已经下发。尽管我们当时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并不明确，但这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却已经不能不受到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了。所以，全会开始后不几天，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六月六日，全会传达了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和军委的部署，中央领导在预备会上所讲的海军问题和空军问题就没有传达。在讨论的时候，一些下边来的同志提出，来北京参加“三·三”会议前，已经听了沿海军区的传达，听了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的讲话，要求传达。有的同志还提出，听说上海会议前军队内部已有部分领导同志察觉了罗瑞卿的问题，包括李作鹏等曾向林彪写过报告，要求将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下发。问题提出以后，会议领导小组开会作了研究。如若是党委常委们都按照党性原则办事，那么，第一，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没有允许传达的问题不应向下透露；第二，问题提出以后应按党委常委会议决议的精神，做好解释工作。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党性原则所能约束了的。事后我才知道，早在“三·二”会议尚未结束，李作鹏参加上海会议回京以后，已经召集了党委部分常委和各舰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就上海会议批罗瑞卿的主要内容和李作鹏等联名写信给林彪的问题吹了风。而且，在这一段会议期间，张秀川

背着多数常委，会外开会，找了若干同志谈话，散布肖、苏问题严重，跟罗跟得紧，海军争论问题是路线问题，甚至违反会前党委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说“团结问题一定要扯，杀头也要扯。”所以，下边同志提出这些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搞地下活动，操纵着会议，却借下边的同志之口，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范围。为此，我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拍了桌子，中途退出会场。

扩大传达范围的报告还是送了上去，六月十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对报告作了批示“我意以照中央规定的文件传达为宜。”这一批示，使李作鹏等的这些活动受到一定的节制，但他们并不死心，仍四处收集材料，散布“这次会议最主要、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肖、苏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问题”，引导会议搞海军中的“罗瑞卿分子”。矛盾既是这样尖锐，海军党委常委在会前准备的“海军党委关于彻底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的检查报告”，无论从检查的“错误”事实还是从“错误”性质上，都不可能被通过。会议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会程一拖再拖。

六月十五日，海军“三·三”会议领导小组开会。由于前段会议某些人的活动，左右了会议的形势，反映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则是矛盾进一步的公开化。会上有人提出全会不要再延长了，因为常委思想不交锋，文件再改也

只能作些修修补补，不会产生好文件，决定把党委检查材料作个“引子”、作个“线索”、作个“资料”，印发扩大会议。同时做了撤销原来常委会议关于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认为该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提出在下一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不管什么问题，不管对谁的问题，都可以大胆揭发批判，要突破一切框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提倡有什么说什么。这些说法都是有所指的，目的是推翻常委会议“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把会议纳入李作鹏等预先策划的轨道，在海军搞“罗瑞卿分子”。

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为了开好党委扩大会议，也为了争取主动，在扩大会议上，我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提出，为了节省时间，集中解决主要问题，这次会议重点是检查我们海军党委，特别是肖、苏我们两个一把手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我和苏振华同志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卿的所谓“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对于罗瑞卿同志，我一向十分尊重他。一九六三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由于贯彻林彪的“三条指示”，海军党委内部的意见分歧表面化了。罗瑞卿同志说过，“海军的问题，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只有四两”，还说过“海军的错误，有它原则性、严重性一面，但还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上的错误”。“海军的主要矛盾，

是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既不是阶级矛盾，也不是人和技术的矛盾”。针对海军的争论，他说过“政治思想既要搞得更细一些，更扎实一些，更好一些，军事技术训练也要搞得更细一些，更扎实一些，更好一些。这二者是不是矛盾的呢，不矛盾。”罗瑞卿同志的这些话，我一直是很赞同的，但在此时被批判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搞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搞折中主义，调和矛盾，抹杀海军斗争的性质，是干扰破坏海军落实林彪三条指示的罪魁。迫于形势的压力，我也不得不根据这些“调子”，检查了自己的单纯军事观点，并上了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纲”。凭心而论，我当时虽在做检查，但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些错误之所在，只是多年来习惯于“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中央说罗瑞卿反党，我们就批其“反党”，党说自己有错误，自己就检查错误。既没有持反对意见的觉悟，也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当时的思想方法局限了我们对问题的全面认识。

随着会议的进展，我与苏振华同志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被动。我所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原因无非是上“纲”不够高，检查不深刻。我看得出来，有人非要把我打入反对林彪、是“罗瑞卿分子”之列。对此，我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当时我对罗瑞卿同志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尚且把握不准，但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却是心中有数的。这些年来，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即便是强调军事技术多一

点，也完全是出于建设强大的海军的心情，丝毫没有与罗瑞卿一起“反对林彪”、“反党”的行动，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我在检查中还极力摆事实，证明自己与罗瑞卿根本没有任何“有谋而合”的行动。我曾经和军委联络组的莫阳同志这样谈过，说我反对林彪，我怎么会反对他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我一直很尊重他，对于突出政治，我也没有反对。我从一建海军就提出打好三个桩子，首先就是政治思想桩子。至于强调军事技术，我是强调了，但是海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很复杂的军种，不强调军事技术怎么行？不强调军事技术怎么能搞海军？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林彪搞空头政治确实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也并不是自觉地在抵制突出政治，只是从尊重客观规律出发，提出海军建设的基本要求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林彪、李作鹏这些“左”的思想恶性膨胀的人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为地制造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从罗瑞卿同志开刀，在全军搞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海军成了最早受害的单位之一。

六月十七日，党委全会转入了党委扩大会议，在李作鹏控制的会议领导小组以党委名义向军委的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经一九六三年一月党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二’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的关

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地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他的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的，都要彻底查清，明辨是非……”

在这种有意识的引导下，会议便以重炮对着我和苏振华，批判我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在简报上刊登对敌斗争的语录，要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七月二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也被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了撤换领导的问题。

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引起了军委联络小组的注意。在这期间，莫阳、刘德润、朱光同志找了参加会议的海军各级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会议情况用简报形式向中央军委、向叶剑英同志作了报告。后来，莫阳同志说，我们来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亲自交代的任务是，带着耳朵去，多听大家的意见，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要随便表态发议论。我们不了解海军党委过去的争论情况和背景，没有任何框框，如果知道，也许还不敢那样鲜明地发表意见，汇报情况。我们只是凭着党性，凭着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从党的传统，军队的传统观点出发，感到他们一个副司令，一个政治部主任，操纵着党委扩大会，搞地下活动，抓住党委第一、二把手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往敌我矛盾上整。甚至想

通过会议罢官、夺权，这种作法很不正常。后来，这三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个问题被斗争，受到残酷迫害。“九·一三”事件后，听说在毛家湾林彪住处，查出李作鹏等给林彪的告状信，信中说莫阳等在海军的“三·三”会议上起了极坏的作用。其实，这些同志只不过凭党性向军委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些情况。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这些情况又很快引起了中央和军委的重视。同样，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则又反映了党内当时的斗争。七月三日，叶剑英同志打电话给我们，提议会议休息一天，重新印发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三年对海军党委扩大会的批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当晚，叶剑英同志同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军的问题，提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表态。一方面，他不得不说“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肖、苏撤了，全军就会乱了，此风不可长。”并说了“海军每个人”，“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的话。另一方面，又指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提出“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林彪的这些指示，是叶剑英同志七月八日亲自来海军传达的，他在传达中连林彪说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

两个直接电话讲的”都作了传达。从后来揭发的材料看，海军“三·三”会议的每一步，都是通过了李作鹏的，而李作鹏是直接受控于林彪的。因此，林彪对海军“三·三”会议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情况，估计叶剑英同志有所察觉，所以将林彪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的加以传达。今天看来，林彪的这些“指示”，显然是在当时海军夺权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搞的一个暂时的退却。这是由于叶剑英同志是旗帜鲜明的，他坚决反对李作鹏等违反组织原则的作法，迫使林彪不得不苟同。很明白，叶剑英同志是用林彪表态中的“此风不可长”，“但不能夺权”等说法，来制止夺权活动的。

叶剑英同志与林彪通话以后，又将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七月四日，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都是第二位的”。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记录，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的意见，对海军的会议作了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肖、苏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七月七日，海军九名常委列席了军委52次常委会议，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委常委参加会议，并特请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参加。由叶剑英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上述指示，叶剑英同志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肖劲光、苏振华两位同志，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对他们的成绩和缺点如何看？这几年，海军一开会就搞这个问题。……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叶剑英同志指出，海军的问题，肖、苏作为领导的一、二把手，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有人想把肖、苏推到黑帮里去。按照这种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是黑帮分子就要罢官，肖、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肖、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的个别同志。你们利用群众的压力罢了肖、苏的官，这说明什么呢？今天我不是说王宏坤同志想伸手夺权，我不这样说。”

叶剑英同志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王宏坤是一个老同志了，但他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放弃了党的原则。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和其在海军工作时间较长，把他推在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

七月八日，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以及军委52次常委会议精神，及时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叶剑英同志还指示我和苏振华同志要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

这样，在以后的会议中，我和苏振华同志都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对前一阶段会议向异常方向发展承担了没有挺身而出的责任，并指出，个别同志想把党内斗争搞成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以牙还牙”重複他们犯过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对他们采用党内斗争的方法，防止再来偏向。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会议对他们搞地下活动，篡官夺权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都作了检查。但不愿意承认搞了地下活动，但会议揭发的材料却又明白地证实了他们搞了地下活动。例如，找了各舰队的同志个别谈话，打招呼，在张秀川家和其他一些地方开会、串联，用暗语打电话，操纵简报组等等。参加地下活动的张秀川检查说，“那些不正当的作法，这次会议发展最严重，去年‘三·二’全会有，平时也有，李作鹏等议论过肖、苏，没有议论怎么能写出‘十条’。”这些检查，尽管一再避重就轻，也还是暴露了他始终在窥测方向，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他说“本来有多少次应该放弃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上海会议，肖、苏参加了，本应放弃，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我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不提肖、苏问题，而后彭真问题一揭，又加深了对问题的看法。当中央指示不扯高级将领问题，自己还不改变。本来中央有指示，‘十条’不向下传达，自己也没有放弃认识。”由此看来，他们在这一段会议中的动作的确是预谋已久的。

张秀川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在后一阶段的会议中，他情绪低落，称病归山，但背后又在布置退却，甚至威胁知情人说“事情牵涉林副主席，讲不得！”的确，随着地下活动的揭露，事情便很自然地与林彪有了瓜葛，这样，在八月十三日，已是副统帅了的林彪，搞了一个所谓对李、王、张的“高度评价”，说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还说“肖、苏是反对我的”，并于八月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连续三次向我们党委常委传达。十八日，从大连回京的林彪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几个老帅和肖华、杨成武等同志以及海军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会议到了“火候”，立即“停战收兵”。实际上是防止把自己牵进去，也保护了李作鹏等人。“三·三”会议对他们的批判揭露就这样停止了。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上了天安门。毛主席看见我们以后，主动过来和我们握手、交谈，要我们团结起来，毛主席对李作鹏、王宏坤等说“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做什么。”毛主席还与我在天安门上合照了一张相。这张我拿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苦笑表情的相片，是那时我的精神面貌的最好反映，如今已有了历史意义。以后李作鹏说，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握过手的人，都是毛主席要保的人。据说，毛主席几次

听了林彪等人告状，要对我罢官夺权时，讨嫌了，说了海军司令还要肖劲光来当，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的话。我想，这些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多次想打倒我而不敢明目张胆搞的主要原因吧！

八月二十五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题目的决议。通过这个决议时，还有一番波折。当时，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把地下活动、伸手夺权的问题写入决议，李作鹏不同意，会下做工作，甚至说，决议不写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我就举手赞成，如写上，我就不举手。最后，决议在林彪、李作鹏的压力下回避了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问题，决议是在有保留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的。卢仁灿同志就专门写了一个保留意见交给了党委。

“三·三”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尽管林彪插了手，但它毕竟是以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而告终的。

### 终于汇入一场内乱之中

“三·三”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已形成浩大的声势，海军内部也开始了动乱。原来我们打算在“三·三”会议上，海军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起认真学习一下中央和军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领会精神，做一个部署，

从九月一日开始，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海军开展“文化大革命”。可是历时两个月的会议，一直集中在批罗联系海军实际上，发展到搞地下活动、夺权，没有能够研究海军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搞的问题，而在会议后期，形势的发展使会议又没有了继续开下去的可能。因为从海军院校开始的“四大”已经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一些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不断有从下边部队、院校来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冲击党委扩大会议，要求揪斗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党委扩大会议不得不仓促结束，各级领导干部急匆匆地各返其位，去迎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迅猛发展的形势，打乱了我们的预定部署。在这以后的十多天里，各级领导都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步，无法控制局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几乎都是群众自发地搞起来的。当时我们海军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很着急，连连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运动的情况，极力想跟上形势，领导运动。其实，何止是我们海军党委，就是军委、总政治部，也没有多少章法。记得我们研究了一个计划，准备海军搞三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月大鸣、大放、大字报，一个月大辩论，一个月整改，到十一月份结束。我把这个安排意见电话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肖华同志说，“要到十一月呀！”感到时间过长。后来，李作鹏又把这个安排报告了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也说，三个

月时间长了一些。于是我们又研究压缩时间，准备搞到月底，最长不超过十一月中旬。那时以为搞个整改就可以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文革”竟搞成一个旷日持久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

在海军最初阶段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中，尽管涉及了海军的许多领导干部，但是，最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张秀川。在给十个常委写的二千多张大字报中，他的就占了一半。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林彪那里。于是，林彪、叶群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两次来海军大院，名曰“看大字报”。按照惯例我将林彪迎接到会议室，他表情极其冷淡，不与我讲话，点名要看政治部的大字报。林彪走后，张秀川在政治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林副主席是来支持我们的！”

这年十月，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大部分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运动的冲击，不亚于坐在火山口上，所以会议气氛很沉重，几乎人人做检讨。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些同志对这次革命很不理解，因为时间短，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他自己也没估计到运动会搞这么大，一个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搞起来了。会议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身上。林彪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调子最高，说“我们要巩固胜利，没有这第三次革命不行”，把“文革”称之为第三次革命。在传达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时，李作鹏说，原来有些

人认为“文革”要刹车了，可现在要大搞。

的确，开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于“文革”，必须重新认识了。原以为搞一段时间就完了，可这时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后，似乎又觉得是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也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文革”运动的“紧急指示”，批判了前一段对运动“压制”的做法，很快掀起了一个运动的高潮。院校的群众组织大规模地串联，到处炮打司令部。我们海军的领导同志也几乎整天陷于接待各院校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与各院校的领导干部谈话解决问题等烦琐的工作中，搞得十分紧张、疲劳。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了，常委会议也不得不经常到常委们的家里去开。但最使我们感到困扰的仍旧是对已经到来的这一切的不理解。我记得叶剑英同志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军级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领导“文革”，要“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是让他搞，“睁”是看动态。这话后来被反复批判过。但我觉得是当时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无可奈何心情的真实写照。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想理解，理解不了。想置之不理，又不可能。我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都如此盲目，整个运动的盲目性可见一斑了。

院校的运动影响到机关，机关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李作鹏、张秀川等和我们这些人差不多也同时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处境更被动一些。因为机关、院校都有两派，其中一派是以李、

王、张为目标，揭发批判他们在“三·二”、“三·三”会议期间的夺权活动。特别是机关一起来，有很多方便条件，又比较知底细，揭发批判的内容越来越深，提出要开张秀川的控诉会，要戴高帽，要抓“中的”、“大的”和“黑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引起了李作鹏的恐慌，他说，抓“中的”，可能是张秀川，抓“大的”，可能是自己和王宏坤。为了扭转形势，李作鹏和林彪一起策划，决定在海军公布林彪“三·三”会议期间对李作鹏等的所谓“高度评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我接到军委的通知，与苏振华、李作鹏一起去军委，由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出面与我们谈话。这时，我才知道一月六日李作鹏给杨代总长写了信，针对海军领导机关和院校有可能串联起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李作鹏等人，认为现在海军的局面是“颠倒是非”的，为扭转这个局面，他提出三个方案，一是请军委对海军“三·三”会议决议表态，把问题揭开，看究竟谁搞刘邓路线；二是将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的对李作鹏等的评价公布；三是把所有的问题重新揭开，进行大辩论。杨成武同志说，他把此信送给了林彪，林彪又让他转送毛主席、周总理。杨成武对我说，“主席、总理的意见是按第二个方案办，请肖劲光同志出面传达一下。”事情很清楚，海军批张秀川，紧接而来的将会是李作鹏、王宏坤，再引深就会涉及林彪，这与当时的整个形势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刹车，怎样刹车呢？就林彪当时的地位，公布一下对李作鹏等的评价即马上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向干部们宣布这件事，李作鹏他们难于启齿，便要我来出这个面。没有第二条选择，只有照办。那时候对毛主席、林彪的指示谁也不会有异议的。但传达这一评价将在海军中引起的后果是明白的，那就是，推翻“三·三”会议的决议，造成整个形势的大转折。

一月九日，李作鹏让秘书送来了他亲笔起草的传达提纲及其说明。说明是这样写的“肖司令：我上午有外事活动，下午又有会议，因此替你讲话写了一个短提纲（我认为不需要讲得更多），能不能用，请你考虑。”以下，便是以我的名义起草的传达提纲。关于“高度评价”全文是“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一个党委第一书记，传达“副统帅”对第三书记的评价，这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才会出现的怪事，而且还要由被评价人代传达人起草讲话提纲，更是怪上加怪。这说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一月九日晚上十点钟，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的海军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传达了李作鹏写的这个传达提纲。果然，形势来了一个大转折，李作鹏借着这个“高度评价”

翻了“三·三”会议的案，“合理地”夺了权，接着以是否支持李作鹏等划线，一大批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月十六日，李作鹏一伙首先揪斗了苏振华同志，名曰“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只是因为他们顾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保护，才没有从我直接开刀，而常委中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等同志以及海军司政后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大都被隔离审查了。一月十八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海军常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虽然我名义上还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靠边站了，成了“空军司令”。

“新党委”成立以后，在海军第一招待所门前召开“庆祝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把一些海军的领导同志揪去斗争。因为我还是名义上的新党委的成员，所以还坐在主席台上李作鹏的身边。会议开到中间，便有些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我。一个造反派跳到我面前，指着我说“肖司令，你反对毛主席”，我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你反对林副主席”，“……”我没有作声，因为林彪就说过我反对他，我申辩也没有用。这时，大喇叭中便口号震天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打倒肖劲光”的口号此伏彼起。两个造反派气势汹汹跑上来揪我，要我坐“喷气式”。我本来对这一套心中有气，这样的斗争方法，有什么政策观念，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看了看李作鹏，他在那里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这一下我的脾气来了，“腾”的一下站起来，把披着的棉大衣一甩，厉声说道“你们哪个敢上来!?”两个造反派看我这样凶，愣了一下，犹豫了，眼睛转向李作鹏，我也转向李作鹏，李作鹏把手一挥，用眼睛暗示了那两个人不要搞了，他们就灰溜溜地走了。会议顿时没了后劲。散会以后，我余怒未消，驱车紧随李作鹏来到他家，我质问李作鹏搞的什么名堂，简直是岂有此理！李作鹏连连向我解释说不是他搞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搞，别人哪个敢搞啊！”他连连说，“下次不搞了，下次不搞了。”

这以后，在李作鹏的指使下，我被造反派劫持到了天津，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房子里。我被搞走以后，家里的孩子们怕我出事，打电话报告了军委领导同志，听说徐向前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查问我的情况，那天正赶上李作鹏在作战指挥室主持交班。李作鹏拿起电话对徐向前同志说，“肖劲光在天津，住旅馆，很安全，没抄他的家”。过了几天，我又被带回北京，正赶上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海军万人大会。

这次万人大会是闻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在海军开创了残酷迫害干部的恶劣先例。主席台上坐着党委新成员，却给了我一个对面的位置，好象坐在被告席上，这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我上台的时候，身后有九个人押着我，说是保护我，防止两派造反派抢我。会上被揪斗的海军领导

同志是苏振华和杜义德同志，司令部、政治部、装技部、航空兵部各有一个代表人物是傅继泽、李君彦、罗斌、赵晓舟同志。斗争会一开始，火力就很猛，六个人坐着“喷气式”上来，挂着牌子，被揪着头发，强行弯着腰，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坐在那里心里一阵阵紧缩着，如坐针毡。这些干部曾和我朝夕相处过，都为我们海军的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啊！既便有错误，也不能采取这样的斗法啊。可是我又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可奈何，无力保护他们。结果，六个人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每批斗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发言“控诉”。批斗中间、拳打脚踢，打倒在地，用脚在头上身上乱踩，围着体育场拖着斗。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脸都碰紫了，我几乎认不出他们的模样，真是惨不忍睹。

不久，又是在海军大操场的三万人参加的大会，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吴自立等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一条腿断了，用筐抬到现场。批斗过程仍旧是加以拳打脚踢。我看着这些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老首长、老同志被斗，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这些上下级之间、老同志之间不能说在具体工作中没有一点摩擦、分歧，但相互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大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共同的、没有疑义的。所以说他们是反革命，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从心里是不同意的。既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党的政策也不允许这样体罚啊！但是在当时，和

大多数老同志一样，我只能听之任之，一方面是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不理解又不敢怀疑，一方面也是怕招灾惹祸。有谁能阻止这场灾难呢？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海军的“文革”，终于汇入了这场无可扼止的全国性的大潮流之中。接踵而来的是“一月夺权”，“二月决战”，“三月总攻”，“四月围歼”……在这四个月里，李作鹏、张秀川等在海军组织的千人以上的斗争大会就有三十多次，中小斗争会不计其数。党委十个常委有半数以上的被整，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海军第三届党委委员三十七名，立专案的十六名，受批判斗争的七名。参加“三·三”会议的一百三十几名师以上干部，除了十几个人外，几乎都因反李、王、张挨了整。李作鹏擅自决定，开展“四大”的单位，立专案不要经过党委批准，这导致下边更多的干部被揪、被整。

海军成了“文革”的重灾区。